

马来西亚“513 事件”与 “308 政治海啸”的比较

——兼论“308 政治海啸”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

廖小健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马来西亚; “513 事件”; “308 政治海啸”; 政治

[摘要] 同样是执政联盟失去 2/3 多数国会议席的优势, 但 2008 年 3 月 8 日大选后, 马来西亚却没有像 1969 年大选那样爆发种族暴力冲突。本文以比较的视野, 在回顾 1969 年“513 事件”的基础上, 分析了 2008 年“308 政治海啸”后马来西亚维持局势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原因。“308 政治海啸”后马来西亚朝野斗争非常激烈, 政治发展充满不确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 D733.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0)05-0009-06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ay 13 Riots” and “March 8 Political Tsunami” in Malaysia —Concurrent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after “March 8 Political Tsunami”

Liao Xiaojian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 Malaysia; “May 13 Riots”; “March 8 Political Tsunami”; Politics

Abstract: Malaysia’s general election held on March 8, 2008, though denied BN their customary 2/3 super majority for Parliamentary seats, just like what happened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on May 13, 1969, did not lead to the similar ethnic riots after the election. Based on analyzing May 13 Riots, the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asons of Malaysia 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after 2008 election. The author insists that political struggle in Malaysia after 2008 election will develop intensely.

“513 事件”与“308 政治海啸”是马来西亚当代政治发展史的重要符号。“513 事件”指的是 1969 年 5 月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全国大选后, 于 5 月 13 日爆发的种族暴力冲突事件。是届大选, 执政的马华印联盟首次遭受重挫, 失去 2/3 多数国会议席和吉兰丹、槟城等州政权。“308 政治海啸”指的是 2008 年 3 月 8 日马来西亚举行第十二届全国大选, 在被称为“政治海啸”的是届大选中, 执政联盟再度遭受沉重挫败, 不仅失去了“513 事件”以来一直拥有的 2/3 多数国会议席, 还丢失了

檳城、雪兰莪、霹靂、吉打和吉兰丹等五个州政权, 朝野政治版图比 1969 年出现了更大的改变。然而, 同样是执政联盟 2/3 多数国会议席优势的被打破, 但 1969 年大选后却爆发了种族暴力冲突事件, 各族死伤人员之众, 史无前例; 2008 年大选后的政治局势虽然也不平静, 但整个社会基本稳定, 没有发生种族暴力或社会动乱, 原因何在? 本文在分析 1969 年“513 事件”的基础上, 拟以比较的视野, 探讨两届大选的异同, 分析第十二届全国大选后马来西亚维持局势稳定的若干原因, 分析

[收稿日期] 2010-04-19

[作者简介] 廖小健,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 暨南大学“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

大选影响及之后马来西亚政局的发展变化。

一 “513事件”的爆发及其原因

(一) “513事件”的爆发

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都是由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组建的政党联盟执政,并先后在1959年和1964年两届大选中赢得2/3多数国会议席。然而,在1969年5月10日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大选中,马华印联盟却首度受挫,未能像前两届那样赢得2/3多数国会议席,而反对党,特别是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席位明显增加。5月13日,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华人支持者举行胜利游行,游行队伍向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在吉隆坡的官邸前进时,与马来人发生冲突。骚乱自吉隆坡蔓延到其他地方,持续了近半个月,史称“513种族暴力冲突事件”(简称“513事件”)。事后,据马来西亚全国行动理事会公布报告书的统计,是次冲突共造成196人死亡,439人受伤,39人失踪^[1]。种族骚乱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在马来西亚是史无前例的。

(二) “513事件”爆发的原因

导致“513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时任首相东姑·拉赫曼指责共产党或秘密会社挑起了此次事件;《五一三悲剧》白皮书认为导火线是华人反对党的傲气;不少人认为种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部分学者则认为“513事件”主要由政治因素引起;也有评论认为,事件是巫统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还有人认为事件只是一起偶然的、纯粹的种族冲突事件^[2];等等。

上述对“513事件”原因的解读,各有各的立场和理由。笔者认为,“513事件”的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差距所带来的矛盾,应是导致种族冲突的深层原因之一。

1. 经济原因

1969年大选前,马华两大族群在经济活动和经济收入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首先是行业。独立前,马来人主要从事农业,华人主要从事矿业和商业,印度人则受雇于橡胶园当胶工。马来西亚独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原来的种族经济模式变化不大,马来人依然保持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1967年马来农民占西马农民的68.68%,而华人仅占19.59%。同期马来人和华人在销售领域的就业比例分别是20.65%和67.22%,马来人在制造业、矿业、建筑业、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就业比例

仅约30%^[3]。从事农业的马来农民主要种植稻米和橡胶,他们普遍缺乏耕地,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据统计,1970年西马稻田为94万英亩,稻农约30万,其中96%是马来人,大部分拥有土地不足3英亩^[4]。

其次是收入。从事什么行业,直接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由于从事农业的收入比从事制造业、商业等其他行业的收入低,而农业中又以马来农民从事最多的种稻业收入最低,因此马来人成为贫困率最高的族群。根据1970年的户口普查,西马有49%的家庭生活在月入200马元贫困线以下,其中,马来人家庭的月均收入低于贫困线,仅为172马元,比同期华人家庭月均收入的394马元少了222马元,两者之比高达1:2.29。马来人的收入也比不上印度人,前者家庭收入的172马元仅是后者家庭收入的304马元的56.57%。结果,马来人的贫困率高达64.8%,不仅比华人的26%高得多,甚至比印度人39.2%的贫穷率高^[5]。

再次是股权。马来人从事经济活动的领域狭窄,收入也相对较低,这些直接影响了马来人的资金积累和马来人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直接参与,马来人对企业股权的拥有也比其他族群低得多。在1970年企业股权的分配中,马来人为主的土著,包括个人和信托机构仅占2.4%,微乎其微,比华人所占的27.2%少了24.8%^[6]。

一个社会里是否存在界限明显和距离悬殊的“族群分层”,对族群关系具有整体性的影响。两个族群在经济能力方面的差距越大,隔阂也就越大^[7],发生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也越大。台湾的古鸿廷先生也指出,不少马来知识分子,就因目睹非马来人(主要为华人)之处境优越,而产生对非马来人之恐惧,触发排华运动^[8]。马华两族的经济差距,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已引起了马来人的强烈不满,成为引发马华种族暴力冲突的潜在因子。

2. 大选前的各种冲击

“513事件”之所以爆发,还与1964年大选后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变化、各种族群课题和社会事件的冲击以及1969年意想不到的大选成绩有着直接的联系。

例如,1964年大选后李光耀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被认为是对“马来人的马来亚”以及马来人特权的挑战^[9]。该概念连续几年不断地冲击着一些马来政治人物的神经,时不时引

起激烈的争论。

又如语文课题。1957年的联合邦独立宪法明确规定马来语是国语和官方用语,英语则在10年内继续为官方语言^[10]。由于宪法并未明确马来语是唯一的官方用语,华社希望到1967年华文能取代英文列为官方用语,并在60年代掀起声势浩大的华文官化运动。同时,马来人也在各州发起“国语月”活动,成立国语月委员会和国语行动阵线委员会,重申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立场^[11]。双方集会宣讲,互抨激辩,群情激昂。马来西亚政府在各种压力下于1967年9月通过的国语法案,没有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但准许联合邦政府及州政府“因公共利益之需要而使用任何其它种族语言翻译官方文件及沟通意见”,华文实际上成为官方应用语文^[12]。但两族对这一折中方案都不满意,马来人的反应特别强烈,尤其是马来学校教师和大学学生,猛烈抨击首相东姑·拉赫曼和联盟政府,认为对华人让步太多。马来人的国语行动阵线还发动游行示威,焚烧首相东姑·拉赫曼画像,以示抗议^[13]。

再有是1967年币制改革的连锁冲击。1967年11月,马来西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旧马币贬值15%,新马币则价值不变。此举对低收入各族人民,特别是马来农民影响非常大,而对主要从事工商业的非马来人的影响则相对少一些。结果,货币贬值触动了种族不满情绪,马来人认为联盟政府不关照马来人利益而重视非马来人利益,巫统自称马来人保护者的地位开始受到怀疑^[14]。同一个月,槟城劳工党分部,为了抗议旧币贬值影响民生发动全岛总罢市,罢市行动后来演变成小规模种族冲突。根据官方记录,冲突发生的当天就有7人丧生,123人受伤入院,槟岛一度实施戒严。骚乱随后数天还蔓延至北海、高渊、北霹雳和吉打南部,使死亡人数续增至二十多人^[15]。事件对社会的震荡也不小。

还有就是华社的独立大学运动。1967年11月教育部宣布了一个关于留学生必须先拥有剑桥文凭(即当时中学结业的政府会考文凭)的新措施。据此,华文独立中学毕业生将很难到其他国家深造。这项规定后来虽然取消,但为了让独中毕业生有更多的升学渠道,1968年4月董教总掀起独立大学运动,筹办独大。运动获得各地华团的积极响应,却得不到华人执政党马华公会的支持。当时,马华与华团的互相辩论,加上独立大学的华文教育特

性,以及独立大学运动的全民动员声势,估计都大大地刺激了马华两族的种族情绪。

因此,1969年大选前夕,种族情绪已经到了将要爆发的临界点,马来西亚的政治情势已经由平静发展到沸腾的阶段^[16]。在这种群情沸腾的情况下,马来西亚于5月10日举行了第三届全国大选,联盟的席位率和得票率都出乎意料之外的低,在国会103个议席里,联盟赢得66席,占64%,不到2/3,它的总得票率为48.5%,低于反对党的51.5%^[17]。在反对党所赢的37席中,华人反对党占了21席,华人的民主行动党,以13个国会议席的成绩一跃成为最大的反对党,而另一个华人反对党民政党不仅赢得8个国会议席,还赢得槟城24个州议席的16席,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个通过选举掌握多数席位组建政府的华人政党。这意味着各种族反对党特别是华人的政治力量已可以在国会民主制度中,通过合法途径挑战马来人的政治地位。选举结果使马来人群情激昂,巫统的一些激进分子,认为马来政治权力和其他特权已受到了严重的挑战^[18]。正是在一连串事件的连锁效应下,种族对抗情绪迅速积聚与膨胀,谣言四起,最终爆发马来西亚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种族暴力冲突,并对马来西亚社会发展与族群关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二 “308 政治海啸”与“513 事件”的比较

“308 政治海啸”与“513 事件”,就对族群关系的冲击而言,有几点明显的不同:

(一) 族群经济差距

1969年“513 事件”后,由于政府的强力扶持,以马来人为主的土著全面地参与到马来西亚的各个经济领域,并取得骄人的成绩,族群经济差距已明显拉近,引发1969年种族暴力冲突的经济矛盾也日渐缓和。

按照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股权重组计划获得很大的成功,土著在有限公司股权的比例已从1970年微不足道的2.40%,提高到2004年的18.90%,华人的同期股权分别是27.20%和39.00%^[19]。

在就业方面,马来人虽然仍是农业领域的主要劳动者,但由于农业在马来西亚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到10%以下,马来人农民的绝对人数已明显减少。马来人在其他经济领域就业的比例大大提高,如

1995年在制造业、商业、金融等收入较高的行业,马来人占的比例分别为53.9%、41.0%和42.5%,而在1970年则仅占20.0%、16.4%和16.4%^[20]。

职业变化使马来人的收入明显增加,家庭月收入的绝对值从1970年的172马元提升到2004年的2711马元,虽然仍低于华人的4437马元,但过去因职业差别造成的族群收入差别已随之收窄。马来人与华人收入的差距,已从1970年的1:2.29,缩小到2004年的1:1.64。随着收入的增加,马来人的贫困率也明显降低,从1970年的64.8%,降低到2004年的8.3%,日趋接近其他族群的水平,^①2004年马来西亚全国的贫困率和华人贫困率分别是5.7%和6%^[21]。

(二) 种族情绪指向

“513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华两族的种族情绪高涨。1957年独立以来,马华两族已因马来人特权、华文教育地位等问题发生诸多矛盾,1964年大选后,从李光耀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开始,马华两族关系更是受到层出不穷的种族与政治课题的频频冲击,种族情绪日积月累,到“513事件”前夕已高度膨胀,达到了沸点临界,具有难以想像的爆发力。在一连串的种族课题的冲击下,彼此对峙的不仅包括族群领袖,也包括不少因语文课题和经济问题影响到的两族大学生和中下层民众。

“308政治海啸”前的马来西亚也有种族课题争论和示威游行。如2006年下半年开始,马华两族围绕诸如“种族输赢论”、“槟城马来人边缘化”、“华人被邻国系统边缘化”、“土著股权报告”、连串宗教纠纷以及巫统年会的激进言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种族情绪一再被挑起。2007年在首都吉隆坡发生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即11月10日由“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发起,约3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11月25日由马来西亚印度教徒权益委员会发起,约1万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前者是1998年前副首相安华被革职引发“政改运动”后,马来西亚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后者则是1957年独立以来印度人举行的首次示威,两者都对2008年大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由于2004年大选前后马来西亚局势曾相对平静,到2006年下半年族群关系和政治局势才逐渐紧张,期间积聚的冲突能量显然不能和

“513事件”之前的情势相比。而且,2006年下半年开始的族群问题争论,基本上是精英论战,马华两族普通百姓很少卷入其中。论战的激烈程度、持久程度和涉及广度,都不能与“513事件”前的种族矛盾相提并论。印度人的示威游行,反映了本族的利益诉求,但矛头主要指向政府,并不是指向马来人。至于马来人的示威游行,同样是指向政府,针对的主要是民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如燃油价格、城市治安、公平选举、反对贪腐等,而不像1969年大选前那样主要针对种族问题,包括经济差异、马来人特权、华文地位等等。因此,“308政治海啸”前虽然也是群情激昂,但主要是朝野政党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对峙,而不像1969年那样,更多的是族群之间,特别是马华两大族群之间的对峙。

(三) 选民背向与大选结果

1969年大选反对党赢得的37个国会议席中,华人反对党赢得21席,马来人反对党仅赢得12席。结果,反对党的选举胜利被视为华人的政治胜利,被指是华人“不接受马来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22],进而引起马来人对本族政治地位的忧虑。

反观2008年大选反对党的胜利,除了得到华印选民的支持外,西马马来选民转向反对党,亦是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是届大选国阵与在野党的总得票率分别为51.58%和47.8%^[23],国阵略占上风,但在马来人聚居的西马,双方得票率却分别为49.65%和50.23%^[24],在野党显然得到更多西马马来选民的支持。是届大选反对党赢得的82个国会议席中,主要代表马来人的政党共赢得54席,分别是人民公正党赢得31席和回教党23席,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则赢得28席^[25]。人民公正党不仅取代民主行动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还成为反对党联盟——民主联盟的主导政党,人民公正党的实权领袖安华也成了在野阵营^①的领袖。因此,反对党的胜利,被视为以马来人为首的在野阵线的胜利,朝野力量的消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马来人的分裂,但基本上不会影响马来人的政治主导地位,所以,马来人没有因之而产生强烈的政治危机感和采取激烈行动。

上述区别,无疑都是“308政治海啸”后,马来西亚得以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另外,“308政治海啸”后马来西亚没有出现社会动荡或

① 在野阵营是指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回教党等三大反对党组建的政党联盟——民主联盟,简称民联。

群体暴力,还要归功于马来西亚全国人民、朝野上下对数十年社会稳定的珍惜与呵护。正是出自防止暴力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共同愿望,大选前,马来西亚警方发出各种预警,警告各政党约束本党支持者的行为,不要上街游行庆祝,以免引起冲突,各州警署均积极部署严密监视各地情况。大选成绩公布后,胜败双方也都非常克制,获胜的反对党没有举行胜利游行,受挫的执政党也没有进行抗议示威。“308 政治海啸”后的一段时间,尽管一些种族激进分子先后挑起多起种族课题争论,如“华人寄居论”、“马来人主权”等,他们也发动人们上街抗议,但都因为得不到广泛响应而始终未成气候,马来西亚人民相对平稳地度过了这次“政治海啸”。

三 “308 政治海啸”后的政治发展

“308 政治海啸”后的马来西亚,始终保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这在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与邻国泰国近几年的示威乱局相比,与菲律宾发生的政治杀戮相比^①,马来西亚政治选举的稳定与“非暴力”尤其难得。马来西亚“308 政治海啸”后的局势稳定显示,尽管存在各种矛盾,但种族暴力或社会动乱,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其有效措施包括缩小社会主要群体的经济差距,防止群体对抗情绪的高度膨胀等。

(一) 打破“513 事件”的“政治魔咒”

“308 政治海啸”后局势的稳定,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以及对华人政治的最重大影响,应是打破了1969年“513 事件”以来“反对党胜利就会发生社会动乱”的安全化论述。所谓安全化,按哥本哈根学派教授奥尔·维佛的说法,就是“将安全与某种事物挂上钩”^[26]。具体到马来西亚,就是将反对党胜利与“513 事件”种族暴力冲突挂上钩。自从1969年爆发“513 种族暴力冲突”以来,每一届大选,国阵都会一再强调“反对党胜利将导致‘513 事件’重演”^[27]。这种安全化论述严重影响了选民特别是华人选民的选择。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他们不少人会选择维持现状,“反对党胜利将导致‘513 事件’重演”的说法,被认为是无法摆脱的“魔咒”。另外,由于华人政党民主行动

党长期都是最大的反对党(只有1999年和2008年大选例外),马来西亚曾流传“马来人在朝,华人在野”的说法,反对党胜利几乎等同于华人的政治胜利,这种情况,也很大程度地影响了马来选民的取向,不少马来人遂倾向投票支持执政联盟,以维持“马来人在朝”的局面。国阵得以长期保持国会2/3多数席位,反对党一直无法在政治上有所突破,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直到2008年大选前,人们还认为国阵应能取得2/3国会议席,否则,马来西亚就可能出现又一次政治大动荡,这是经历过1969年“513 事件”排华事件血的教训的马国选民所最不愿意看到的^[28]。

然而,“308 政治海啸”大选虽然打破了执政联盟占国会2/3多数席位的局面,改写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但并没有像大家所担心的那样出现种族暴力或社会动荡,甚至连小规模暴力冲突都没有发生。反对党获胜并没有导致族群暴力或社会动乱的现实,说明马来西亚人民及其政党政治的成熟与理性。既然局面是可以控制的,既然“反对党胜利将导致‘513 事件’重演”的魔咒已经解除,那么马来西亚选民特别是华人选民在以后的选举中,就可能不太受约束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包括继续支持在野联盟。因此,打破“反对党胜利就会发生社会动乱”的安全化论述后,马来西亚朝野政党的竞选,将在一个比较平等的政治平台上展开,这将有助于在野阵线争取选民支持,赢得政治上的突破。

(二) “308 政治海啸”后的朝野政治较量

“513 事件”以来“反对党胜利就会发生社会动乱”的安全化论述被消除后,反对党进行政治动员的成效明显提升。相对地,过去曾有效左右选情的各种因素,如新首相效应、政府调整族群政策、增加发展拨款等,则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大部分选民产生直接的影响^②。结果,在“308 政治海啸”后举行的11场国会议席和州议席的补选中(见表1),在野的民联赢得8场补选,执政的国阵仅赢了3场。在西马补选中,国阵还出现了七连败,而1969年“513 事件”后的补选,绝大多数都是国阵赢。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曾形容,巫统在“308 政治海啸”大选后的处境“如履薄冰”,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29]。尽管为了赢得每一场补选,

① 如2009年11月23日,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马京达瑙省发生了劫持和杀害数十名人质的血腥事件。

② 尽管政府不断调整族群政策,但不少华人选民依然支持在野的民联,在2010年4月乌雪和5月诗巫的补选中,华人选民对民联候选人的支持率分别从“308 政治海啸”大选时的62%提到72%(乌雪),58%提到68%(诗巫)。

双方都倾尽全力，竞争异常激烈，如2010年5月砂拉越诗巫国会议席的补选，决定输赢的398张多数票，仅占37524张总票数的1%^[30]。

表1 “308政治海啸”后的马来西亚补选情况（2008年8月-2010年5月）

次	时间	地点	席次	获胜阵营
11	2010-05-16	砂拉越诗巫	国	民联
10	2010-04-25	乌鲁雪兰莪	国	国阵
9	2009-10-11	森美兰峇眼槟榔	州	国阵
8	2009-08-25	槟城柏玛当巴西	州	民联
7	2009-07-14	吉兰丹马力勿来	州	民联
6	2009-05-31	檳城本南地	州	民联
5	2009-04-07	砂捞越峇当艾	州	国阵
4	2009-04-07	吉打武吉士南卯	州	民联
3	2009-04-07	霹雳武吉干当	国	民联
2	2009-01-07	登嘉楼瓜拉	国	民联
1	2008-08-26	檳城峇东埔	国	民联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4月26日、2010年5月17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资料整理。

结语

通过对马来西亚“513事件”与“308政治海啸”的比较，我们起码可以得到两点有益的启示：（1）经济差距和经济矛盾是族群矛盾或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尽管经济利益的分配很难达到完全的公正与公平，差别与矛盾不可避免，但如果能缩小各族群或各社会群体的经济差距，维持经济利益的一定平衡，无疑将有利于促进族群和谐与社会稳定。（2）维持社会稳定需要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其中包括构建防范历史悲剧的集体意识，警察部队的有效预警和切实戒备，各主要党派的领袖与成员加强自律，以及广大国民理性地对待各种有争论的课题，谨行慎言地防止对峙情绪急剧膨胀等。

“308政治海啸”及其后局势的稳定，打破了“513事件”以来“反对党胜利将导致社会动乱”这一政治论述的“魔咒”。今后选民投票会更自由，反对党有了更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与良好的竞争平台，朝野两大阵营的较量将比以前更加激烈，选举结果难以预料，马来西亚未来政治发展充满悬念。

【注释】

[1]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第254-255页。

[2] Leon Comber, *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 Kuala Lumpur: Heinemann Asia, 1983, p. 62; 杨建成，前引文，第237页等。

[3] Donald R. Snodgrass,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K. 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8.

[4] Wan Hashim, *Peasants under peripheral capitalism*. Bangi: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988, p. 86.

[5] 〈马〉冷眼：《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华人经济地位问题检讨》，见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问题论丛》，（马来西亚）玻璃市州广东公会奖助学金委员会出版，1983年，第40页。

[6] Adopted from th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nsultative Council, 1991, Table 14. 转引自林水椽等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337页。

[7]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种族关系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9、339页。

[8] 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28页。

[9] 杨建成，前引文，第210页。

[10] R. K. Vasil,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0, pp. 38-40.

[11] 〈马〉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3年，第137-139页。

[12] 杨建成，前引文，第212页。

[13] Leon Comber, op. cit., p. 62.

[14] 杨建成，前引文，第217页

[15] 〈马〉王国璋：《反思五一三》，（马来西亚）《人文杂志》2002年第15期，第8页。

[16] 杨建成，前引文，第214页。

[17] 〈马〉何启良：《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论述》，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年，第63页。

（下转第21页）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ASEAN in the ASEAN Charter process”, GRIN Publishing, <http://www.grin.com/e-book/120420/>

[17] Alan Collins, “A People-Oriented ASEAN: A Door Ajar or Closed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 323.

[18] Mely Caballero-Anthony, op. cit., p. 251.

[19] Jose S. Concepcion, “Creating a compassionate globalization: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SEAN”, Keynote address at the 10th Council of Asian Liberals and Democrats Conference on Current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for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10 December 2003. <http://www.cald.org/website/10th%20Anniversary/presentations/concepcion.htm>

[20] Hidetaka Yoshimatsu,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Business Interes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6, No. 2, p. 234.

[21] Amitav Achaya,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sian and world order after September 11”, in K. Booth and T Dunne, eds., *World in Collisi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 London: Palgrave, 2002, pp. 194 – 204; Amitav Achaya, “The Retreat of Liberal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17, 2002, p. 5.

[22] Donald K. Emmerson, “Critical Terms: Security, Democracy,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Donald K. Emmerson, ed., *Hard Choices: Security, Democracy,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Shorenstein APARC, 2008, p. 14.

[23] Donald K. Emmerson, op. cit., pp. 13 – 14.

[24] Amitav Acharya, op. cit., p. 386.

【责任编辑：郭又新】

(上接第 14 页)

[18] 林水椽, 前引文, 第 83 页。

[19] 林水椽, 前引文, 第 332 页; 《2004 年, 5 大主旨落实国家使命》, (马来西亚) 大马经济平台网, http://www.mytrade.com.my/index_MainChiNews.htm, 03 - 04 - 2006

[20]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Slangor Darul Ehs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5, p. 109.

[21] 林水椽, 前引文, 第 329 页; 《较第八计划多 67% 115 亿建廉屋组屋》, (马来西亚) 《南洋商报》2006 年 4 月 1 日。

[22] (马) 许德发: 《历史幽灵与马来西亚的记忆政治——试论 1969 年“五一三事件”的各种阐释》, (马来西亚) 《人文杂志》2002 年第 15 期。

[23] 《朝野得票率 52: 48 公正党成国会最大反对党》, (马来西亚) 中国报网, <http://www.chinapress.com.my/topic/2008election/default.asp?dt=2008-03-10&art=0310maa57a40.txt>, 2008 - 03 - 10.

[24] 《49.65% 对 50.23% 国阵西马得票率比反对党低》, (新加坡) 《联合早报》2008 年 3 月 20 日。

[25] 《马来西亚第 12 届全国大选投票结果》, (新加坡) 《联合早报》2008 年 3 月 10 日。

[26] 〈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著, 徐伟地等译《当代安全与战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第 113 页。

[27] 〈马〉祝家华: 《解构政治神话——大马两线政治的评析 (1985—1992)》, 吉隆坡: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4 年, 第 293 页。

[28] 社论: 《马国大选国阵面对严峻考验》, (新加坡) 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yl/sl080227_501.shtml, 2008 年 2 月 27 日。

[29] 《巫统如履薄冰》, (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2009 年 10 月 12 日。

[30] 《多数票 398 张行动党险胜》, (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2010 年 5 月 17 日。

【责任编辑：代帆】